

寻找共产主义的尝试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

刘继安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中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引介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和独特的认知体验,倾向于把马克思的学说理解为一种人道的而非暴力的,互助的而非斗争的理论,不赞同中国社会形态封建说,对阶级对立也有不同的观点,这一切都与马列经典理论的阐释有较大差异,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的理路和痕迹

关键词:李大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观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29(2012) 01-0007-06

李大钊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十月革命后开始逐步把目光从西欧转向了俄国。史学界通常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1]

但1918年前后李大钊不仅发表了几篇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同时也在介绍其它的救国思想,而非马克思主义一家。这显然不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信仰的人所应有的态度。李大钊为什么在被史学界认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第一次论战的“问题与主义”之后继续支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所发起的“好人政府”的主张呢?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又是怎样的呢?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同吗?如果不是,他自身的独特性又在哪里?

一、李氏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民国伊始,国人尚不知马氏为何的年代,细细想来,并不是一个十分统一与契合的名词,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建构过

程和复杂的普及阶段。“马克思”主义,顾名思义就是有关马克思的一系列主张和思想的学说。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对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了如下的描述:“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在这篇较早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李大钊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民主主义和劳工主义”。在随后热情洋溢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胜利基础上针对军国主义而提出的,即“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2]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详细描述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接着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是针对个人主义而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否认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经济学”。^[3]可以看到李大钊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胜利基础上的社会革命,“乃是新发生的德、俄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4],这应当是我们理解李氏马克思主义合理的前提条件。李大钊在1921年就专门阐释过这个问题,他说“极端主张发展个性权能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项目(YFC090078)

收稿日期:2011-10-08

作者简介:刘继安(1987-):山东临沂人,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

者,尽量要求自由,减少社会及于个人的限制;极端主张扩张社会权能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个人主义可以代表前说,社会主义可以代表后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5]

有关“主义”一词在李大钊的论述中频繁出现,无论从他的文章题目还是文本内容中都可略见一斑:新中华民族主义、极东门罗主义、复仇主义、惩戒主义、防卫主义、必要主义等等,可见民国初期主义是一个泛化的名词,李氏文本中的“主义”一词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学说或者是观点的意思,与今日政治化的术语大不相同。现在倾向于将主义与马克思联系起来,将主义赋予一种神圣和崇高的意味,这与当时是截然不同的。再者,李大钊1918年11月至12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三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前后,也介绍过有关欧洲民主政治的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达科儿之“爱”观》《培根之偶像说》《新中华民族主义》穆勒的自由主义、平权主义等,李大钊在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1918年之后,还发表文章介绍过《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支持并参加了自由主义者胡适等人发起的“好人政治”。可见李大钊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众多西方理论当中的一种介绍到中国来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信奉也并非对资产阶级自由观的抛弃,而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扩展,这也就能够解释理论上身为共产主义者的李大钊为何去支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胡适的政治主张^①。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民主观的对立,在李大钊的文本中没有得到体现,合理的理解应该在于他将无产阶级的民主建立于资产阶级民主之上并将其扩大。共产主义不是抛弃民主,而是追求更高阶段的民主。无怪乎李大钊说:“democracy, ergatocracy,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6]“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 democracy 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 democracy 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他看作与 democracy 是两个东西。”^[7]

有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李大钊在多篇论文中阐释过,大同小异。

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中,“照现在的情形讲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很有分别。昂格思作了一篇序文,郑重声明这是共产党宣言,不是社会党宣

言。昂格思说,在一八四七年顷,所谓社会党人乃是那些在劳工阶级运动以外求援于智识阶级的人们。不论多少,只要有一部分自觉的工人,渐知只是政治的改革还是不够,从而主张有全社会改革的必要,这一部分工人可自称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的运动,是中流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起了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家是无产阶级,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又有半有产阶级在德国,起了政治革命,他们却自称为社会党人。一九一九年共产党在莫斯科开第三国际大会,代表共产党,以示别于代表中产阶级的第二国际大会——社会党。……可是共产主义者却称社会主义者为黄色的社会党,黄色的国际。”^[8]在这段文字描述中,李大钊清楚地将社会主义者等同于社会党人的革命,也就是第二国际的道路,将共产主义理解为苏俄似的革命,即列宁派的革命。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中,李大钊的用语和举例与上一篇文章如出一辙,意思也完全相同。

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中李大钊语出惊人,认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存在殖民地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国家,本国既经改造,殖民地亦受其利。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下是否应有殖民地存在?社会主义下仍有殖民地存在,是否与社会主义精神根本冲突?此疑很易解答。社会主义的精神,固极主张民族自决。倘使经济情形已能自立,如印度、朝鲜等,自应任其自主。而若经济进化过于低浅,苟非于经济上助其开发则永不能达于自决的境界,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有提携掖进的义务。故社会主义下,本国对于殖民地所当作的事,乃是一种义务,不是一种权利。这可称为新殖民政策。”^[9]

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今人每将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混谈,其实此二次大有区别,……与其谓此二字为根本原理上的区别,毋宁谓为程度上的区别。共产党称为左翼,社会党称曰右翼(第二国际)。所以社会主义,包含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种。”^[10]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是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的主张,而共产主义是俄国人的主张,程度与范围上比社会党人要广。同时,李大钊将圣西门、傅立叶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费边社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都作为社会主义的学说,而与苏俄的共产主义相区别。^②

① 1921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还引用了胡适好政府主义的三个条件(彻底的觉悟,公共的目标,好人的结合)来评论工人政治的优秀之处,可见其深受好人政府主张的影响。

② 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对上述几种社会主义学说都做了详细介绍,根据文中行文与事例的阐释、结果的剖析来看,作为第一个详细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人来说,限于当时落后的文献出版状况,如此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理论的准确描述,于一个身兼数职的革命活动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笔者怀疑李氏是对某一文献的第二次翻译与加工,由于材料有限,留此存疑。

二、阶级竞争而非阶级斗争

李大钊在对马克思的学说介绍中,使用了“阶级竞争”这一独特的词汇,而非阶级斗争。通常习惯性地将其等同于“阶级斗争”,实不尽然也。首先,在李大钊所处的民国初期“表示‘斗争’‘打仗’的汉语成今天的形式‘斗争’直到20世纪初才产生”^[11]。所以说,在当时“竞争”与“斗争”还不存在互换互等的意思。

在中国古代的金文当中,“竞”类似为两人一起踢球的场景,互相争抢的意思。而在《说文》中则是两个人共同抬一个东西。而“斗”在古文字中的场景则是两人互相抓对方的脸。

竞争的前提是两个人,而斗争的目的则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消灭。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和字义的理解来看,斗争远比竞争表达的程度要深远和强烈。

同时,从李氏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其对竞与斗的理解程度上还是有区别的。“宇宙之中,蓄涵二力,二体以上,互争为存…天生之体,互为抵抗,以竞存立”^[12]³⁷“统治之体,以具雏形,更展其力,则有外竞;偶失其势,则有内争”^[12]⁵⁷⁵。竞与争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事物有序性的正常发展,在意义和程度上是对等的,同时“若夫宗教之传播,言语之扩衍,教育之灌输,风俗之同化,无不呈竞争之象,助战争之势”^[12]⁵⁷⁷。战争的程度在李氏话语中明显的强于竞争,自然要比斗争低。其次,竞争建立在保守与激进两种政治信念之上,但是二者的政治信念“不可相竞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盖二者均属必要同为永存,其竞立对抗乃为并驾齐驱以保世界之进步也”^[13]。竞争如果不能保证世界的进步,那么竞争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第三,竞争要建立在调和博爱基础之上。“言调和者,须知调和之机,虽启于两让,而调和之境,则保于两存也。今人不解调和之真义,因于一切分当竞进之事,而皆有所怀疑不敢自主之概”^[14]李大钊从东西文化不同场域出发,认为竞争与调和并非单纯的对立关系,他认为“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合的法则,常是生存的法则”,“余爱竞立之调和,余否认牺牲之调和”^[15]³⁵⁴。

可见无论是从用字的选取,还是文章内容的剖析,我们都可以看到李大钊对于马克思学说中有关阶级运动的理解都是要“阶级竞争”而非“阶级斗争”,其意义与程度不能等同视之。

三、阶级互助取代阶级竞争

在阶级竞争的表述中,李大钊特意强调“马克思

的阶级竞争说,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15]³⁵⁶。他并不赞同马克思关于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这一基本性的观点,而是认为“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15]³⁵⁶。人类应该互助相爱,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总结一句话: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15]³⁵⁶主张以后人类要用阶级间的互助来取代阶级竞争。李大钊在文本中明确写到:“我们要晓得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就可以发现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庭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15]³⁵⁴

能够看出,李大钊并非毫无选择,不加区分地全部接受马克思的学说,实在是难能可贵。其次,李大钊并不赞成阶级竞争的理论,他想用阶级互助的方法来代替显然过于严酷的阶级竞争,这种讲求人与人关系的协作与帮助带有浓厚的儒家仁爱色彩。

结合李大钊所写文章的时代背景就可以发现,李大钊为什么会对阶级互助理论而不是其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抱有更大的兴趣与吸引力。若是单纯依靠马克思学说中的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那么中国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时机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阶段。而通过互助与自觉的创造,李大钊才能够看到尽快将中国从贫穷落后的面貌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

四、调和论而非暴力论

“人莫不爱美,故人咸宜爱调和。盖美者,调和之产物,而调和者,美之母也。”^[16]“现代文明,协力之文明也。贵族与平民协力,资本家与工人协力,地主与佃户协力,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协力。”^[17]在提出调和是文明进化、社会幸福的途径之后,李大钊进一步指出:“言调和者,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言调和者,须个人于新思想接触之际,自宏其有容之性,不专以己排人,不挟同以强异,斯新旧二者,在个人能于思想得当之分以相守,在社会上即能成为势力而获相当之分以自处,而冲突轧轹之象可免,分崩决裂之祸无虞矣。”^[18]

接着李氏根据自由民主的理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经验出发,认为“且夫善良之政治,非可以

暴力求也。从良知所诏,则无论何时皆反对暴力,其终极目的,亦在消免革命之祸,纳强力于法律范围之中使不为暴,则吾侪反对革命之勇”^[19];认为暴力革命不能获得一种实际上的自由,人们必须从良知中剔除暴力,一个由暴力发家的政权,一直奔驰在极端的领域,往往会产生以暴易暴,以暴压人的情况,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无法得到根本之和平。只有通过协和的方法纳强力于法律之内,以达政治进化之目的的良好愿望,才能实现他心目中人道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朱成甲先生在《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一文中曾谈到:“李大钊在《甲寅》日刊的言论和在《晨钟报》的言论是有很大不同的。《晨钟》时期,李大钊强调的是理想主义,对于旧传统、旧势力的批判态度;而在《甲寅》日刊时期,李大钊所贯彻的则是面向实际。对于各种现实矛盾的批判态度。”^[20]亦可提供一些旁证。拥有这种对原有文化与新知识的矛盾态度,李大钊深切地体会到“吾侪际此新旧衍嬗之交,一切之生活现象,陈于吾侪之前者,无在不呈矛盾之观,即吾侪对于此种之生活负担,无在不肩二重之任。”^[21]

胡适曾经在《独立时论》上发表了题为《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对自由主义的内涵作了全面的阐释。胡适先生说:“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世间的民族,在这个大运动里,努力有早有晚,成功有多有少。在这个大运动里,凡是爱自由的,凡是承认自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的,凡是承认自由难得而易失故必须随时随地勤谨护视培养的,都是自由主义者。”^[22]^[2044]人人皆渴望自由,这段话看起来与共产主义者所要达到的自由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走什么样的道路来获取自由。胡适先生接着说:“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我个人也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轨道的国家里,自由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22]^[2047]如此对比就能发现,李大钊的思想中含有浓厚的自由主义理路。他也在提倡自由、人道的同时反对暴力革命。

五、劳工神圣的组织

李大钊在《少年中国运动》一文中号召青年做两

种文化运动:一种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种是物质改造的运动。精神改造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性。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做工,做工的人都能吃饭。李大钊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中生动描述了这种工人的“游惰本性”,“他们(指工人——作者注)平日既没有什么团结,这回举动,又靡有正大的要求,罢工的时候,系由工头持刀斧在门前堵守,不许进去做工,像这种没有结合的罢工,无意识的罢工,强迫的罢工,自然是没有效果了。”^[23]^[658]工人手持斧头阻止其他工友上工的做法,是李大钊所反对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工人素质的低下。同时,李大钊还提到工人生活有颇多恶习,“把两星期的工作在一星期作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23]^[659]在李大钊的文本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对工人境遇的同情,但也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他并没有把工人阶级当作最为先进的阶级来看待,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的定义有很大的区别。其次,有关劳工本身是否就是工人阶级这一概念也有待商榷。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确实提到劳工神圣,并且毫不吝啬的加以礼赞。但是他的文章中没有对于劳工是什么作出明确解释,很容易让后人轻易地理解成为工人阶级即是劳工阶级,这点看来是有问题的。笔者在翻阅《新青年》杂志时猛然发现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是与蔡元培先生的文章《劳工神圣》、陶履恭《欧战以后的政治》一同作为欧战以后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演说词而收入《新青年》杂志《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中的。可以说,这三篇文章是作为一个共同的主题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共同发表的。那么既然主旨相同,意思相近,也可以作为思想史材料上的互证。无独有偶,蔡元培恰恰向我们提供了什么是劳工的极好材料,可以作为李大钊论述的一个补充。蔡元培先生说:“劳工神圣!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24]工人是劳工,农民也是劳工,知识分子也是劳工,总之,一切通过自己劳动获取价值的人都是劳工。而并非单纯的工人阶级本身

是劳工。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一种人道主义的劳工神圣的组织是李大钊理想中的社会生活状况。

六、统一时代而非封建时代,自由民彝而非阶级专政

李大钊早年在对《法学通论》一书所做的批注中指出:“中国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孤立时代,部落时代,封建时代和国家统一时代,但我国发展与马氏所述西欧社会发展历程有所不同。我国早在皇神祖天皇时,就平定了国内叛乱,统治权遂归皇室,其间虽经历过封建时代,但这仅限于制度上的变革,丝毫无损于国家的统一”,在国家性质的划分上,并不认为明清为封建社会,而是国家统一时代,也不赞成我国主要是封建社会的观点。在社会组织结构与阶级划分问题上,李大钊认为“然吾华近于平民政治,往昔已然,欧美儒者亦所公认。统察社会,实无阶级之可言,较之欧美大有殊异”。^[25]“吾尝思之,中国自唐虞之世,敷教明伦,亲九族以协万邦,家族之基,于以确立,聚族为村,有礼俗以相维系,国家权力之及于民者,微乎渺矣”^[26];“惟是中国虽云专制,而专制效力所不及之外至为广远,盖除收税,折狱外,强半取放任主义,此中国自由民权之精神所以长存而不没也”。^[27]李大钊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没有明确的阶级和阶级对立,国家也并非严格的封建专制,更多的是一种所谓的半自治状态。这一切,都与马氏所述西欧社会发展历程有所不同。

而什么才是李大钊心中的理想政治呢,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首先批判了那些大盗窃国,暴厉恣睢的残暴统治,断言“终当听命于民彝而伏诛于其前”。^[28]^[245]“民彝是一种特殊的礼器,古代是国家神明尊严之所托。李大钊认为古代政治上的神器在于宗彝,而今天政治上的神器在于民彝。民彝就是民意,“在其天性之和合,而浚发其资能之所固有,如量以显,勿益其所本无,以求助长之功,而其效易睹。”^[28]^[147]也就是要顺应民意。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根据统治者的喜好而喜好,“但求其同,不容其异,专制之源而立宪之反,其结果发到法网日密,民命日残,比户可诛,沿门可惨也。”^[28]^[147]则会变成彻头彻尾的专制政治,与民彝不符。既然专制制度不适应民彝,那么什么才是吾民适宜之政治,“则惟民主

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28]^[149]虽然代议政治起源于阶级之争^①,但是人类迄今最为良善之政治。

鲁迅先生在评论李大钊的思想时曾说:“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29]作为当时著名的社会评论家,显然没有过多的党派色彩和溢美之词,鲁迅先生的眼光和判断还是很中肯的。当时尚在海外学习政治学的著名学者张奚若在看到李大钊的文章后评论说:“《新青年》中除足下(指胡适——作者注)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30],也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

李大钊真正表述的马克思主义更像是一种理论而不是制度,马克思主义观与社会主义制度在李氏的解读中找不到必然的逻辑关系。综观上述的论据,李大钊的论述中有一种强烈的启蒙现代性的观念:对进步的诉求、改革的冲动、民主与科学的想象,这种历史目的论的观念为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提供了路径与方法,同时又反过来为李大钊的思想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以“实现主体自由的社会改造方案”。^[31]而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思想,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先知先觉,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对于启蒙现代性方案的自觉加工,只是这种加工带有一种时代环境所特有的扬弃色彩。总之,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去衡量过去的价值观,要如实地理解过去。李大钊思想有一种介于启蒙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中间性,有启蒙的信念,但是没有急于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资产阶级启蒙的思想消解,也没有像共产主义那样把这些资产阶级的观念囊括进较高形式的共产主义加以空洞地礼赞或者把其当作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加以无情地鞭笞。所以说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尚是一个胚芽,明显地带有自由主义的理路和痕迹。

参考文献:

- [1] 靳宝峰,孟祥林.唐山市志(第3-5卷)[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3532.
- [2]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M]//李大钊全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59.

① 李大钊原文是“夫代议政治虽起于阶级之争,而以经久之历验,遂葆有绝美之精神焉。”

- [3]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M]//李大钊全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
- [4] 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 [M]//李大钊全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87.
- [5] 李大钊.自由与秩序 [M]//李大钊全集(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53.
- [6] 李大钊.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 [M]//李大钊全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 [7] 李大钊.《国体与青年》跋 [M]//李大钊全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64.
- [8] 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 [M]//李大钊全集(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 [9] 李大钊.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 [M]//李大钊全集(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6-137.
- [10] 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 [M]//李大钊全集(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94-195.
- [11] [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74.
- [12] 李大钊.战争与人口 [M]//李大钊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13] 李大钊.辟伪调和 [M]//李大钊全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58.
- [14] 李大钊.调和之法则 [M]//李大钊全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6.
- [15] 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 [M]//李大钊全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6] 李大钊.调和之美 [M]//李大钊全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41.
- [17] 李大钊.青年与老人 [M]//李大钊全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4-35.
- [18] 李大钊.调和剩言 [M]//李大钊全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10.
- [19] 李大钊.暴力与政治 [M]//李大钊全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8.
- [20] 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414.
- [21] 杨早.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57.
- [22]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6册) [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 [23] 李大钊.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M]//李大钊文集(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4] 蔡元培.劳工神圣 [J].新青年,1918,5(5).
- [25] 李大钊.一院制与二院制 [M]//李大钊全集(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2.
- [26] 李大钊.国情 [M]//李大钊全集(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8.
- [27] 李大钊.《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 [M]//李大钊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320.
- [28]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 [M]//李大钊全集(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9] 鲁迅.《守常全集》题记 [M]//鲁迅.刀边生活.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118.
- [30] 张奚若.张奚若致胡适 [M]//胡适往来书信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 30.
- [31] 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6.

Attempt to Look for Communism —— LI Da-zhao and His Outlook of Marxism

LIU Ji-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1,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arliest China intellectuals to spread Marxism, LI Da-zhao's interpret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experienced a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unique cognition. He tended to interpret Marx's theory for a humane and mutual-aid theory, rather than a violent and fighting theory. He disapproved of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al form as feudal society and harbored reservations about class antagonism. All of these are different from classic interpretation of Marx-Leninism and bears the vestiges of liberalism.

Key words LI Da-zhao; communism;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